传播习俗学论纲

杨立川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北大学传播文化研究丛书

传播习俗学论纲

杨立川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习俗学论纲/杨立川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224－08569－3

Ⅰ.传… Ⅱ.杨… Ⅲ.传播学－研究 Ⅳ.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5699 号

传播习俗学论纲

作　　者　杨立川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蓝田立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6.37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8569－3
定　　价　15.00 元

序　一

刘建勋

我常常想，孔子《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难道不是他老人家为我们描述了当年他所经历的一种文化传播盛宴的场面，并且揭示了当时的文化传播者应当具备的传播心态吗？然而，也许由于某种文化习得性遗传的原因，到现在，许多教科书中，仍将“时习之”仅仅注释为经常温习。这样，三句话就成为逻辑上互无联系的并列语句。其实，“时习”应当是经常研习、讨论。这样，紧接着的后面两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才有逻辑上的联系与依附。

有人说，中国人自宋元以后，在社科研究、制度创新方面的能力下降了。这话虽不一定全面，但引之为反省、警策，还是必要的。传播学自上个世纪初中期在发达国家孕育诞生，将近半个世纪，在我们的社科研究中，在重视程度和创新研究方面，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接近新世纪到来，学者们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问题上，给予急切地呼吁。这当然不光是知识分子心态变化所能完成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也为学术研究的长河注入了不竭的活水。

杨立川教授的《传播习俗学论纲》，正是在传播学研究本

土化的期盼声中孕育而成的。

通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说，每个民族都有该民族自身得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生息绵延的密码。传播习俗几乎涵盖和涉及社会习俗、民族习惯的方方面面。它习惯性地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言语方式、行为方式和传播沟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发掘它，研究它，实质上是在发掘和研究一个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所长期积累的传播智慧。我很同意立川教授的提法：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习惯性、风尚性的传播现象。在人类整个传播现象中，它具有基因性的意义。为解读“密码”，揭示“基因”所从事的艰苦劳动，肯定是具有十分可贵的价值和意义的。

当然，传播习俗的发展、流变，也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普遍而显著的规律。立川教授的《传播习俗学论纲》在这方面也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关注。他认为，“搞清人类社会生活究竟是如何决定了人类传播习俗的形成和变化，更进一步说，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传播习俗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传播习俗研究不能缺少的视角。这种系统的视角、动态的视角，使得传播习俗的研究成为一条滚滚而流的活水，为后续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也留下充分的伸扩空间和开掘的余地。

《传播习俗学论纲》对传播习俗的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不仅如此，该项研究还具有清楚的实践性价值和清晰的应用性思路。例如，自觉利用传统节日的传播习俗服务于当代的传播实践，利用习俗性的传播形式，改进新闻事业的传播方式，中国广告传播如何利用中国传播习俗，以及自觉地使广告文案写作服从于传播习俗等阐述，都十分具有应用研究的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点。应该说，这也是一代年轻学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锻造的学术实践新品格、新思维、新视野。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呼吁已久矣！成果出现也十分令人高兴。我其所以赞同本土化呼吁，并且以欣喜的心态迎接这些成果的出现，是因为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有它独特的价值和使命、方法和规律。科学是具有普遍规律和共性的，但共性常常寓于个性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民族特性和地域、国别的特点。应该说，人文社会现象常常与民族、国度、地域文化因素等有着非常具体、深入的联系。所以，文学艺术上有个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这个命题的价值，也可以扩展到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应该给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研究一种启发：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性的话语权！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首非常有意味的唐诗“报花消息是春风，未见先教何处红。想得芳园十余日，万家身在画屏中。”我总觉得，我们正处于大众文化、学术文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新时代到来的当口。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艰苦奋进的不竭动力的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习俗的研究，将越来越引起文化界、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它与一个新学科——传播学研究视角的巧妙结合，深刻联系，切近得当的剖析，是正当其时的。因此，我们可预测，关于传播习俗本土化的研究，一定会不断深入，成为傲立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化园地的一枝芳菲。

（作者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

序　二

段京肃

还是1983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认识了来自西方世界的传播学，并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它的学习和研究最终成为我的职业。传播学能有今天的规模和学界地位，是当时我们大家都不曾想到的。其实我们关注传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传播学才真正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时，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有留学背景的几位老师面向本科同学开始了传播学的教学，引进了施拉姆和麦克卢汉等人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学界的促进下实现了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先生的访华。施拉姆先生和华裔学者余也鲁先生等人在大陆进行了传播学交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余也鲁先生等学者开始关注并大声疾呼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邵培仁，1998）我理解他们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传播并不是西方人特有的社会活动，传播学同样

也不应该是西方人的专利，在深厚的中华文化中蕴含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传播和传播理论上无限的智慧和成果。用中华民族丰富的传播实践和传播思想丰富世界传播学的宝库，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义务和责任。

近三十年来，两岸学者们在挖掘中华民族传播成果方面已经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相对于西方的传播学而言，我们对传播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受西方传播学的影响很大，学者们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对西方传播学规范的借鉴和使用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和实践的遗产的整理和研究上还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

在浩繁的中国文化典籍中隐藏着不计其数的传播思想和实践的宝藏，同时在中国的民间和广大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散落了大量的传播思想和传播实践的珍珠，寻找这些隐藏的和散落的宝藏和珍珠，是形成中国传播学宝库的基础性工作。台湾的关绍箕先生、大陆的孙旭培先生等学者都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还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大的精力才可能形成传播学中国化的气候。

如何真正建立中国传播学的学派，而不是简单地空喊所谓“本土化”的口号，是目前我国传播学界和每一位传播学者面对的共同问题。况且人们对“本土化”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所谓的“本土化”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认为，本土化并不是抛开西方传播学的主流学派而另起炉灶的传播学研究，像世界上的其他学科一样，尽管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研究的模式，但作为科学它必然有许多基本的东西是世界共通的。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如何在尽快掌握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的

基础上，挖掘、总结、抽象出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精华，并采用世界传播学的主流模式和方法进行研究，应该是“本土化”的基本取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期盼中，我见到了杨立川教授的《传播习俗学论纲》书稿。书不厚，但在我心里它的分量仍然是沉甸甸的。

杨立川教授长期在西部学校从事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就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条件而言并不理想。但他并没有因为条件的限制而放弃对自己钟爱的传播学研究的追求，相反在艰苦的努力中他找到了独特的研究对象。《传播习俗学论纲》同作者本人一样扎根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沃土中，从源远流长的黄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书中大量使用了历史上保留下的和今天仍然在百姓生活中常见的传播实例，用中国人最熟悉、最亲切的生活和生产内容来说明复杂的传播学原理，拉近了传播学理论同人们生活的关系，增加了抽象的学问同人们之间的亲切感。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曾经长期在西部生活的人来说，读《传播习俗学论纲》的感觉恰如找到了故乡的家园。

关中、晋南、豫西和甘肃中南部这一块地方曾经是华夏文明发源、生息的基地，我们的祖先在这一块土地上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举，也留下了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展的珍贵遗产。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被后人称道的许多事实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如历史上最早的报纸“邸报”，证明中国古人传播智慧的万里长城烽火台，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等，都给今天的新闻传播研究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珍贵的史实。同时这块土地又是众多民族和文化反复交流、融合的重要场所，许多历史悠久的中外文化现象在这里得以保存，成为研究人类历史的活标本，自然也是研究人类传播历史的活标

本。在《传播习俗学论纲》这本书中，杨立川教授带领我们进入了时空的隧道，在古今的结合中完成了对中国腹地的一次传播民俗的全面考察。那些仿佛刚从黄土地上随手捡来的一个个闪亮的珍珠，经作者用一根红丝线穿在一起，便有了令人称奇的魅力。

在研究传播习俗学这条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但我想这阻止不了像杨立川教授这样的默默耕耘者的脚步。

目　　录

绪论　传播习俗学研究发凡 …… (1)

原 理 篇

第一章　习俗与传播习俗 …… (9)
一、习俗 …… (9)
二、传播习俗 …… (14)
三、传播习俗的形成与发展 …… (25)
第二章　传播民俗 …… (30)
一、传播民俗现象概说 …… (31)
二、传播民俗的特点 …… (34)
三、传播民俗的类型 …… (42)
四、结语 …… (44)
第三章　流行性传播现象 …… (48)
一、丰富多样的流行性传播现象 …… (48)
二、流行性传播现象的特征 …… (54)
三、利用流行性传播，服务于传播实践 …… (56)
第四章　中国传统节日与中国传播习俗 …… (60)
一、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播学意义 …… (60)
二、中国传统节日传播活动的习俗性特征 …… (63)
三、自觉利用传统节日传播习俗服务于当代传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实践 …… (66)
第五章 中国传播习俗与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管理 …… (70)
一、新闻传播对语言习俗的利用 …… (71)
二、利用习俗性的传播形式，改进新闻传播方式 …… (78)
三、传播习俗与媒体包装 …… (84)
四、结语 …… (87)
第六章 中国广告应与中国传播习俗相契合 …… (89)
一、广告对中国传播习俗的利用很普遍 …… (89)
二、中国广告传播如何利用中国传播习俗 …… (93)
三、利用恶俗而消极迎合某些消费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 (98)
第七章 语言习俗与广告文案写作 …… (100)
一、广告文案应与广告对象的语言习俗相契合 …… (100)
二、自觉地使广告文案写作服从于传播习俗 …… (102)
三、如何使广告文案契合语言习俗 …… (104)
四、广告对语言习俗的利用应该注意的问题 …… (104)

专 论 篇

一、年节的传播学意义 …… (109)
二、中秋传播习俗 …… (124)
三、广告与中秋传播习俗 …… (132)
四、广告传播习俗与广告传播教育 …… (137)
五、当代中国乡村传播关系的几个特征 …… (145)

六、中国乡村的传播形式与广告宣传 …… (152)
七、农村广播的生存环境和生存之道 …… (158)
八、陕西某乡乡村传播中的家族传播与亲戚传播的基本模式 …… (170)
九、文化全球化·中华传播习俗与当代中国广告传播 …… (178)

后 记 …… (186)

]

绪论　传播习俗学研究发凡

1999 年，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由该校新闻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共同主办。会上，大家对中国传播学界 20 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既表示了肯定，也认为尚存在许多不足。会后于 2000 年元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传播学论文选萃Ⅲ·出版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反映当时诸多学人的看法："1982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我们现在在'系统了解'方面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从总体上讲，我国传播学尚处在引进和介绍式研究阶段。……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正任重而道远。"

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又感到，其一，对于外国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确应充分系统地介绍，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应自主创造。我们不可能等到完全充分系统地引进介绍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再去自主创造。换言之，引进介绍的过程中即可或曰即须自主创造。其二，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这不是绞尽脑汁可以设计出来的，而首先须关注中国的传播现象和问题，中国特色的传播规律正存在于中国自身的传播实践中，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不过是对中国传播规律探

索总结提炼的结果。而中国的传播习俗则无疑映聚了中国传播规律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以为对传播习俗的研究首先是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次，对传播习俗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把握包括大众传播现象在内的整个传播状况。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先生说："虽然传播学在中国已落地生根，但始终未能成树成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未能同中国的实际传播情况有机结合起来。传播学来到中国说明中国对传播学产生了需要。但这种需要能否化为学术之林中的一片亮色，还要看它融入中国文化的程度。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如此，在传播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我国不少学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像徐培汀、徐耀魁、余也鲁、徐佳士、关绍箕、刘建明、孙旭培、丁柏铨、尹韵公、明安香、李良荣、邵培仁、喻国明、戴元光、吴文虎、陈培爱、郑学檬、申凡、陈力丹、孟建、黄旦、何庆良、吴予敏、黄星民、方晓红、关世杰、段京肃等和其他许多学者都是如此，因为他们，才使得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呈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也许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还未成为大树，成为森林，但起码一株株树苗正在生长。我之所以认为须对传播习俗进行研究，目的之一即期望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有所贡献。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时候，我向大会提交了《年节——中华民族的传播盛宴》一文，并在论文摘要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民间传播习俗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尹韵公先生在第七次全国传播学

研讨会上的开幕词中充满期待地预言：“传播学研究在新世纪一定是王气很盛，发达之计始于斯。”这也是我自己的希望，同时我希望为此而有所贡献。

研究传播习俗，首先应抓住的一个问题，是要探讨传播习俗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

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在人类社会整个传播现象中，它具有基因性的意义。它常常非常强烈地影响到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甚或一次传播活动的面貌、成败。它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并随着人类社会生活诸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传播习俗学所要研究的，首先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们的传播习俗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人类的传播习俗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反作用。

由于社会生活具体而言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子系统构成的。人类的传播系统包括习俗性传播现象不过是渗透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特殊的子系统，因而我们研究传播习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即是要研究传播习俗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与传播习俗之间的互动关系或曰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定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一定的传播习俗的形成，社会生活也决定了传播习俗的发展变化。例如，在传统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诸多家族传播习俗，随着社会生活条件如生产方式、政治状况等的变化，也必然地发生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如同寒潮来了天气即会变冷那样。传播习俗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在总体趋势相同步的前提下，又存在着局部的不同步现象。而尤其应注意到的是，习俗

的惯性往往还特别强大。

因此，传播习俗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是探索、描述、分析传播现象的渊源流变，即研究传播习俗的历史，搞清人类社会生活究竟是如何决定了人类传播习俗的形成和变化发展。更进一步说，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传播习俗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同时，还要搞清传播习俗对社会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其作用是否符合人们的目的或需求？如何使传播习俗能够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并防止其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如此等等。

人类的传播活动总有一定的形式、内容、规模，习俗性传播活动也不例外。那么，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又是如何地影响到了相关的传播习俗？

质言之，我们研究传播习俗，即是要弄清楚，社会生活究竟怎样地决定了人类传播习俗的形成、发展变化及传播习俗本身的形式、内容、规模，这是一种发展论视野。要弄清传播习俗的社会作用问题，这是一种功能论视野。要弄清社会生活与传播习俗本身的形式、内容、规模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本体论的视野。

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还会发现，传播习俗是通过对人类整个传播活动发挥作用进而又对人类社会生活发挥作用的。因而，传播习俗同传播活动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能够忽视。即是说，这一问题也无疑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仔细留心一下人类的传播实践，我们就会发现，传播习俗正如同人类的整个传播活动的基因一样，具有传播基因的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